

作为文化景观的文学生产及展示

——以新疆兵团女性知青文学创作实践为个案

艾美华 艾维依

内容提要： 因为新疆兵团特殊的屯垦戍边史，使得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新疆兵团女知青文学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兵团文学的发展比较缓慢，文献资料也较少，文章在仅有的范围内，以兵团精神为主要线索，融入到当时的历史去研读作品，对这一时期的兵团文学有一个深层次的梳理，同时也为后期的文学发展提供资料的整理。

关键词： 女性文学 知青 文学形象 新疆兵团

兵团女性知青文学的概述及其代表作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间，援疆的女知青们带着建设新疆的愿望来到戈壁滩，时代的特殊性赋予她们顽强，也给予了悲哀。当时的兵团女知青文学以小说为主，也兼有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在小说中，以《军队的女儿》《母亲和我们》《兵团往事》等为例，讲述了女性的顽强和伟大，她们从女性过渡到最坚强的女劳动力，高强度的劳动让她们忽略了自己的软弱；渐渐有了家庭的她们又成为“戈壁母亲”的代表，有着传统的中国女性美，绝不向困难低头；但向往爱情的她们，在感情面前却只能服从安排，以致产生了诸多悲剧。这些作品在内容上，基本都带有一定的英雄主义，忽略了艰苦的经历；都受到了主流政治观念的影响，带有一定的固定化思想模式。在描写手法上，基本尊重时间顺序，常常按事件发生的过程一步步跟进，增强叙事效果。

（一）兵团 1950 年至 1970 年间女性知青文学的概述

兵团女性知青文学作为兵团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新疆的建设发展历程所影响着。新疆从 1950 年起开始了屯垦戍边，为了鼓舞战士们的干劲，上级同意带有家

眷的战士可将亲属安排过来,并且解决战士们的婚配问题。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从山东和湖南应招了大批女兵,这就有了“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动人故事。这些女兵虽然都是积极参与,但只有部分是目标清晰,大部分因为文化程度有限,对于应招目的并非十分清楚,但唯一能确定的是——她们都想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中期,又从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招来了一批女知青。除了这些知识青年,还有一批名义上“被改造好的妓女”也被送至兵团。从男女失调的层面上讲,女性更多地被诠释为一种坚强与柔情的化身,她们的到来一定程度上也鼓舞了士气,在文学描述中也更加的理想化。正是这样的背景下,兵团女性文学在这一时期打下了独特的烙印。在兵团女性文学的成长中,兵团文化也在影响着它、丰富着它,所谓的兵团文化,即:“其成员所认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遵循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体现的心理素质、理想信念和性格特征的总和。”^①这样的文化同样也受着当时环境的影响,这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丰富。

(二)兵团1950年至1970年间的女性知青文学代表作

兵团女性知青文学初期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主要指导方向,共产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在作品中成为最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兵团女性文学创作也被上纲上线,大众化、平民化的特点凸显。文学的创作一直重视意识形态,但兵团女性知青文学有着强烈的新疆本土文学气息,作品中也多反映兵团发展的沧桑历史。同时,为了鼓舞人们的干劲,在文学上也刻意将主观的积极思想扩大化,忽略了最初的真实思想,这也是兵团文学在描写女性状况时的一大弊端,容易极端化。在文学期刊上,最重要的就是兵团文联创办的《绿洲》,它记载着兵团文学的发展。在小说中,如邓普《军队的女儿》,韩天航《母亲和我们》,郭晓力《兵团往事》,季麦林《婆拉姑娘》等,都是着重描写女性,展现女性的坚强与伟大的作品。除此之外,不得不提的还有第一部表现战士保家卫国、保卫边疆,由著名作家黄碧野创作的《阳光灿烂照天山》。在诗歌创作中,同样主观意识强烈,创作完成后流传到基层群众中去鼓舞干劲,多数都是顺口溜形式。在这些诗歌中,把开垦边疆的人们作为对象,虽然没有明确的女性描述,却也将女性涵盖到对象中。此外,因通讯、报告文学等简单易学,所以很受青睐,用垦荒成绩的细节体现出人民的力量,并对于英雄事迹及时表彰以号召大家学习。

这期间描写女性的文学也反映了女知青们的心理变化与敏感。对于她们而言,除了来开垦建疆,还担负了解决在疆干部的婚配问题的任务,这对一些并不清楚状况的知青来讲,敏感的党政问题与她们的思想是相冲突的,因此她们的心灵多少也受到了伤害,这也成为女性文学的素材。

^① 朱晓进等著《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5页。

兵团女性知青文学中的主流价值观及描写表述

(一) 主流政治文化对文学的影响

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对于女性的描写,手法单一,有着强烈的时代印记。作品受到主流政治文化的影响,这其中所谓的政治文化,即“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①而兵团作为边疆新产生和建设的一个家园,不稳定的环境是政治文化所赋予的背景,这种主流政治观念渗透到文学创作中,使文学情感上有一种固定式的思维。并且当时的艰苦环境需要更多的英雄主义去鼓舞大家,如邓普《军队的女儿》中描写的主人公刘海英积极响应号召到新疆去支援边疆建设,她救人并且病魔缠身,却从未放弃自己,优秀的价值观成为了典范来宣传。在这样的作品中,简单朴素的语言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政治文化情感。

此外,作家自身的情感也不可忽略。在小说中,作家极力地美化女主人公,让她成为人们心中神一样的存在,这也是作家自身情感压抑的一种释放,包含着他的政治理想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描述的虽然含蓄,却很真实。知青们想要奉献祖国,在当时知青文学的描写中,将无私奉献的情感带入作品的创作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在兵团女知青文学中,因为女性起着重要的意义,她们在文学中的地位就更加重要,在文学创作中也就产生了像《军队的女儿》这样的代表作品。比起江南知青的婉约,西部的女知青更多的是坚强,哺育代代边疆儿女,才会有“戈壁母亲”精神的产生,这也是作家情感倾诉的一个层面,表现出了对女性的伟大的赞美。

(二) 尊崇时间顺序的描写及避开苦难经历的表述

这些作品在描写上都极力地轻描淡写,把一切苦难都一带而过,用乐观积极去应对,对于她们的知青生活也是描写很简单,基本都是讲述了自己如何积极响应号召来到新疆、建设新疆,并且在困难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很少有负面的情感或是描写出现。在郭晓力《兵团往事》中,女主人公刘玉秀就是一个典型,她经历了感情的起伏变化,亲朋好友的叛离,却始终积极地面对,用女性的坚强丰富了人物形象。但是无论作家们如何淡化苦难,我们都从中看到了戈壁滩上女人的伟大。

^①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9页。

当时的文学都比较尊崇时间顺序,常常按事件发生的过程一步步地跟进。在叙事学中常可分两种——外显叙述者和内隐叙述者,“外显叙述者可以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也可以是一个从外部闯入的叙述者,而内隐叙述者则出现在所谓隐蔽或不露痕迹的叙述中。”^①知青文学在创作中比较传统随大流,因此在叙事过程中事件的发展与时间基本保持一致,让读者形成假象,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好像是随着故事的发展和人物主人公一起感受同样的情感,从而引起共鸣。在《兵团往事》中,虽然开始采用了倒叙的描写,写到主人公刘玉秀站在博物馆前回想自己的经历,但之后的描写就进入正题,随着事件的发展而追随时间,从年轻写到老。在外显叙事或是内隐叙事中,基本都是全知性的视角,在确定一个主人公的主线前提下,也将描述扩散到多个人物事件中,相互交叉,为小说制造悬念。在这样固定的模式中,起初会让人们感到厌烦,对于所读的作品会缺乏新鲜感,但反之也有好的一面,知青文学本身就是伤痕文学的一种存在形式,固定的描写方式加深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文学也反作用到人们的情感中,让人们产生共鸣。

女性知青的形象分析

(一)解决驻疆部队婚配问题的特殊使命

邓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创作了《军队的女儿》,讲述了刘海英在经历人生的磨难后依旧保持一颗火热的生命之心,用最崇高的信仰感动和鼓励着身边的人们。这类作品是当时红色作品中一个成功的典型,“作者邓普在创作时从宏大叙事的角度,采用了最经典的主流文学的叙事模式,即赞扬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精神,谱写了一曲牺牲自我、献身革命的理想主义的颂歌”^②。主人公刘海英满怀革命理想,在她最美丽的年纪,病魔找上了她,不断的纠缠她,她并没有被打垮,反而在抗洪救灾的过程中奉献自己,挽救“八一棉”,为兵团抢救资源。在她的生命中,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为人民服务,正是她这样的正面形象,英勇顽强,作为年轻小女孩却丝毫无畏的精神和青春的特殊性,使之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文学名人,也为兵团招募知青和女兵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宣传。这样也往往让人们忽略了成长的她作为一个女人的细腻情感和生理特性。

同时,也让人们忽略了女知青们的另一任务,除了屯垦戍边外,还肩负着解决驻疆官兵的婚配问题。慢慢地,作家们开始弥补女性在文学中的细节描写和细腻的情感,作为生理区别的本质、命运的转折都成为关注之外。女知青们初来乍到时,告别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

^① 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2-63页。

^② 张吕:《从〈军队的女儿〉看边疆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方,来到遥远的边疆,怀着一颗奉献自己的青春给祖国的热心,要做像刘海英一样的人物,她们相信应招时在报纸上给她们的“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的承诺,憧憬新疆的美丽——“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还有覆盖着白雪的天山,气势磅礴、充满神话色彩的昆仑山,一望无际的草原,美丽富饶的绿洲”^①。当来到新疆的那一刻,现实摧垮了她们,不仅完全相反,甚至还要剥夺她们爱情的权利。在《兵团往事》中,主人公刘玉秀来到芳草滩后先是面临姐妹因恐惧逃跑而牺牲,后又因组织安排迫不得已嫁给不如意的团长陈万忠,心里却一直念着自己的初恋李书文,但最终还是拗不过组织的安排,刘玉秀选择了服从,当李书文出现在自己面前时,感情与现实让她选择了家庭,在那样的年代,女性无法选择自己的归宿,她们来到新疆的任务似乎只有一个,任何的反抗都是无力的。虽然在女性婚姻与爱情的选择上,小说并没有过度的描写,但也能让我们感到一丝心酸。

在生理上受到压迫后给予他们的是自尊的侵犯,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她们,满心的文学气息,却被现实所击败,只有少数是幸运的,她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屯垦建设中,感受成功的喜悦,她们也靠自己的顽强完成任务,回到自己的家乡,让这段经历成为最深的回忆。

(二)从女性的生理属性过渡到坚强的女劳动力

《兵团往事》的开头,刘玉秀、徐静兰等人来到戈壁,在车上喝的水都是汽油桶运输的,那奇怪的味道让人难以下咽,美好的憧憬在这一瞬间被毁灭,还要警惕土匪的袭击。坚强的玉秀没有服软,带头喝了第一口水,在来到芳草滩的时候,数量不多的女人成了男人眼中的宝,尽量为她们提供最好的条件,但姑娘们并没有接受,在田间作业不比男人差,在田间排碱,坚硬的田地不是走不动路就是站不住脚,姑娘们想法在身上绑上木板,刘玉秀的双腿在水里泡得糜烂,发烧晕倒田里,这种顽强的拼劲让你无法看出这是一群文弱的女子。在这样的环境下,她们没有选择,只能忽略自己的生理特性,融入到建设中去,容不下丝毫犹豫。作家们在对这样的女性塑造中也尽量忽视她们的生理特性,将她们描写成伟大的英雄进行宣传。

在《八千湘女上天山》中,吴梅苏为修渠道背石块,每次都背七八十公斤,因为体力不比别人好,她甚至半夜就起床出门;李蔚华生了孩子的第二天就去劳动了。正是这样的坚持与奉献才能给予建设更大的动力,证明女子的力量,这种牺牲有时候是家庭、自己的身体、甚至是生命,那种一门心思劳动的黄牛精神是现在很难再看到的。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对男女平权的立法与其说是对不可剥夺的女性自然权力的维护,不如说是以此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民族国家建设的基本手段。国家将妇女从家庭之中解放出来,为的是将妇女组织到国家的结构之中去。走出家门的妇女是国家一个巨大的劳动力资源”^①,这在兵团的建设中就有很

^① 卢一萍:《八千湘女上天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8、33页。

强烈的体现。许多妇女为了赶工,过度劳累而数月不来例假,有的怀着身孕还在坚持干活却最终因劳累失去了孩子,又或是缺乏营养在生产时失去生命。比起赞美她们的牺牲奉献精神,更多的是一种伤痛,她们作为女人的辛苦、被剥夺作为母亲的幸福的痛苦,虽然岁月磨平了许多,但心灵的伤痛却是一直存在的。这让她们现在再回想起以前的艰辛时,更加的珍惜现在、拥护共产党。

(三)作为母亲奉献戈壁的伟大

母亲本身就是伟大的词汇,在戈壁滩上女人像胡杨一样的坚韧与顽强。中国自古就是男权至上,虽有母系社会的存在,人们也注重孝道的实用性,却始终会忽视女性的独立和应有的个性。因这些女性来到兵团的任务之一就是成为妻子或是母亲,这是她们的使命,这样的命运渐渐使得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一种义务,往往会忽略了她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所能享受的平等。

她们在每天承受超出体力劳动量的同时还要兼顾家里的生活。在韩天航的小说《母亲和我们》中,讲述了母亲伟大而又平凡的一生,从第三者的描述视觉出发,更能深刻地表达出母亲的细腻与艰辛,展现了人性的光辉。母亲刘月季的婚姻来自于介绍包办,起初丈夫钟匡民并不认可,在有了志同道合的爱人后毅然地抛弃了刘月季,但这样的打击并没有击垮她,她选择带着儿子独自生活,并帮助前夫的妻子,一个人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培养成材,在团场人最艰苦的时候奉献自己物资,为了坚守自己贞洁一生再未嫁,这样的女人让人动容,她身上的能量传播给下一代。这样的伟大是作者将“戈壁母亲”这样的形象美好化的一种方式,是在男性的叙事角度上所敬仰的“圣母”,这样的美德一直都体现着中国传统中的妇女贞操,她们将现实过滤,抛开女性所拥有的思虑、隐秘,取而代之的是毫无缺憾的完美,这是一种人们心中的理想人物。除了刘月季这样的完美形象外,《八千湘女上天山》中的周姐,也是一位兵团母亲的形象,她美丽纯洁有抱负,战士们都喜爱她,她的存在能净化人们的心灵,但就是这样的人物,在被迫安排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时,她的精神受到了刺激,她疯了。即便这样还是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她这样的女性比起刘月季的自愿性,更多的是一种被迫的悲哀,失去了自我的同时,还要被沦为男人性欲发泄的工具,并成为母亲。这样的“戈壁母亲”形象因作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达含义。

兵团女性知青文学的发展

回顾兵团文学发展的这些年,文学创作的内容在不断的丰富,文学创作的表现形式渐渐

① 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39页。

的多样化,题材和体裁也充实了不少,更多的优秀作家走在了文学创作的前沿。在兵团初建时期,文学存在的意义除了记录历史、抒发情感,更多的是以一种定式的表达去鼓舞开拓兵团的人们。在这样的文学描写中不可忽视的是女性的地位,这与建疆女知青的奉献密不可分,她们从柔弱到坚强,有时甚至是要接受命运的安排。

坚强的她们也有反抗的牺牲,就像《兵团往事》中的巧妹,在看到这样的环境后后悔和恐怖使她努力想逃离,却悲惨地死在了戈壁滩。在董立勃的《白豆》中也写到了白麦为了反抗自己的婚姻,做出了一系列在大家看来不合乎常理的事情,最终还是以服从告终,她们没有自己的爱情,即使有,也只能默默的放在心里。因为人们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劳动上,没有时间思考太多,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坚强的女人们选择挑起家中的重担,成为最伟大的“戈壁母亲”。

正因为这样,像《军队女儿》那样的积极向上,无私奉献的主流文学成为女性角色中的重点,比起抱怨,女性们需要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让她们的坚强有充实的理由。在《母亲和我们》中,刘月季被丈夫抛弃的情况下,依旧顽强,帮助丈夫和新的妻子克服困难,散发人性的光辉。在那些兵团文学中,有最简单质朴的言语,但正是这样的淳朴,才让下一代兵团人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收获,理解女性的伟大,将屯垦精神继续发扬下去。同时,也为兵团文学的发展提供更丰富的素材来源,更加关注女性视角的独特性。

在新疆兵团文学中,女知青作为文学描述的一个群像占有独特的地位,在文学描述中她们是可敬仰的对象,她们是坚强的“戈壁母亲”,她们是最美的劳动力,她们身上的特殊使命也赋予了扎根新疆的决心和悲剧的心理。在文学创作中用定势的方式,顺应时间顺序的描写,宣传兵团精神,弘扬兵团文化。

本文为 2014 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新疆社会经济统计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新疆农村宣传思想文化动态调查分析研究”(项目编号:050314B05)前期研究成果。

(艾美华,新疆财经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艾维依,新疆职业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

【责任编辑:刘大先】